

胡秋原

著

古代中国文化与
中国知识分子

下册

中华书局



41

胡秋原 著

古代中国文化与
中国知识分子

下册

中华书局

草原与河川之抗争

我们知道,民族移动(völkerwanderung),是历史的主要动力之一。有史以来民族移动之潮流,无论中外,其策源地实在今日中亚北亚(包括我国满蒙新疆)。此大而言之,可称欧亚大陆(Eurasia),小而言之,可称中国伊朗之间(Seriran)。折衷而言,可称中国巴比伦之间(Ser-Mesopotamia)。这实在是历史枢纽之所在。不幸我国历史,只详于玉门关以东,长城以南。而西洋历史,只详于黑海以西,里海以南。由于这一带常为旋风之中心,及居民之缺乏历史乃至文字,玉门黑海之间,长城里海以外,竟是历史的一大空白。直到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我国经营西域以后,才有若干记载,然而大部分是附带性的。这是史学界最大的恨事。如果这空白不能填补,世界历史不仅不能圆满,甚至许多问题,可变成无根之谈。这是史学界之处女地。直到最近,由考古学家在西亚及欧亚大陆草原一带之发掘和研究,使我们对于先史时代到历史时代之间人类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而生的分化与斗争,有较明确之概念;〔注五一〕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所谓“汉学家”,对中西历史文献,作了许多比较研究,使我们对中西历史交涉,也有较明白概念。〔注五二〕这离打开历史之锁之日尚远,但这一历史空白区域,大见光明了。历史不一定本为整体,但必趋于整体。而这整体之结合点,实在中国大西北方面。所以我想先对有史前后欧亚大陆情况,尤其是中巴与中伊之间历史作一概观。

由自然环境不同,人类文化发展,自始不均齐。在旧大陆,东自蒙古高原,横断新疆中亚,西至南俄匈牙利,南经伊朗阿拉伯高原,至萨哈拉大沙漠,形成一连续而单调的欧亚与亚非草原沙漠地带。而在亚非草原之北,欧亚草原之南,则有河川平原地带。草原地带之北之东,为森林及滨海地带。草原河川之间,为山岳及盆地。当河川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草原地带居民非不知新石器技术,但仍保持旧石器时代工具。盖对付鸟兽之皮,旧石器仍有用也。及河川民进入青铜时代,草原民及山岳民均采用之,但各用以适应其环境。山岳民常为河川民之后补者。而森林地带之居民,有原住森林地带者,亦有游牧民失败被迫逃于森林中者;于是有南下而为游牧民之后补者的,亦有被穷迫,远至北冰洋,至今仍继其渔猎生活,而表现为中石器或骨角

器文化圈的。故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在旧大陆的居民,即分化为两大系统:一是由亚欧到亚非大陆草原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其次是河流平原地带的农耕民族。而在二者之间的山岳盆地,则有半农半牧的民族。游牧民外,则为林木中之狩猎民。

气候之变动,文化发展之不均齐,常促成民族移动与斗争。在远古时代,空间甚大。及干燥作用(desiccation)或水灾等事发生,人类尤其是游牧民,追求水源,发生移动;而邻近的农牧两种人民,最初发生集团冲突,而冲突且日益扩大。山岳民与森林民有时是缓冲者,有时是参加者;或为失败一方之就近继承者。而最富于动力性者,则为游牧民。尤其是在游牧民统一森林民后,或者森林民统一游牧民而游牧化后,常为历史上之扰乱因素。

从来民族之斗争,似有三大方式:一是南亚洲之草原民族(阿拉伯)对其北面农耕民族,以及北亚洲之草原民族对其南面农耕民族间争夺水源之争;二是北欧洲的海边森林民族与南部农商民族争夺海岸之争;三是东亚与中亚,中亚与西亚(欧洲本为亚洲半岛,埃及在亚欧之端,皆包括在内)争夺商路之争。前二者是南北之争,后者是东西之争。三者常以“两海之间”〔注五三〕(新疆中亚),小亚细亚(土耳其及叙利亚)为通道与焦点。

三者之中,最为重要,而与我们关系亦最大者,是第一种南北斗争,即北牧民对南农民之斗争。不过,游牧民对农耕民之进攻,常因农耕民文化较高,技术占优势而不能顺利,如是向东西伸张两臂,采取钳形攻势。而当农耕国家之内或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反而常为游牧民进攻农耕民的机会。另一方面,农耕民为了防御游牧民,亦常向东西两方面扩张领土,或同盟范围,以增强实力。所以南北战争,亦必促进东西之合并或合作。

有史以来,我们便看到游牧、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之入侵,或破坏他们之间的商道。在中国,有猃狁戎狄匈奴之属之对黄河流域之南侵,由此进入内蒙甘肃青海西藏以及北印(此段过程在秦汉以前最不明)。再西,有各种游牧民族对伊犁、塔里木二河,阿姆、锡尔二河,以及印度、恒河二河之夺取,由此进入波斯印度;对两河流域(米索布达米亚)之夺取,由此进入波斯与高加索,土耳其与埃及,因而巴尔干与西班牙。

此外伏尔加河与第尼泊河,多瑙河与莱茵河一带,亦有同类情形。许多文明民族在盛时都能将这潮流推走,甚至在对抗中发展武力,乘势建立

统一帝国。而在衰落之时,即为此潮流淹没,或等待机会再起。中国亦复如是。民族与帝国之兴亡,文化之摇篮与坟墓,都在这潮流的源头,尾间和两岸。

自古迄今,人类史实为此南北战争与东西离合之交错。

在中国以西,除了巴基斯坦的情形尚有待于澄清外,我们已经知道,苏末人和埃及人最初进入农商文化。历史之第二幕,是游牧民的闪族(Semitic)登场。他们在当时原是蛮族,其故乡也许是阿拉伯。大约公元前四——三千年后,他们一批一批到两河流域。自前二八五〇年苏末人王国起,他们造成无数王朝之兴灭。他们来来去去,亦自相攻伐,与埃及人及其他蛮族战争。其中下层阶级,连着其他难民,则到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海边,向海上发展(如腓尼基)。前十四世纪,有亚拉美亚族中希伯来人之登场。他们先破坏了许多文化,然后来学习文化,并对人类今日文明作了基本的贡献。到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止,他们是西亚乃至中亚的主人。但在闪族文化最发展时期,在欧亚草原森林,即中亚北部,还有两大群蛮族。一是在东在北操乌拉阿尔泰语的,二是在西在北操雅利安语的。〔注五四〕前二〇〇〇年后,所谓雅利安人(自然连带一部分乌拉阿尔泰人)开始一批批出台。最早者也许是赫梯人(Hittites)、卡西特人(Kassites)、米坦尼人(Mitanni or Hurrians)。他们是由中亚将马带到西亚的。到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和以后,则有印度人波斯人之南下印度波斯,弗里基人(Phrygians)吕底亚人(Lydians)希腊人之进入巴尔干,以及拉丁人克尔特人之西进欧洲。到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在各处取闪族而代之,唯始终未入阿拉伯。〔注五五〕大概而言,公元前三千年以降,中亚以西,经常在一大战国时代。(参看 A. C. Haddon, "The Wanderings of Peoples"; 威尔士,《世界史纲》。)

这和我们纵非无关,但在春秋以前,中国因不在这漩涡之中,所受影响甚小。我们打开地形图,可以看出蒙古新疆和青康西藏两大高原外围的高山,以“世界屋顶”之葱岭(帕米尔)构成一个箭头,指向西方,隔着东亚与中亚。此天然之障碍,使中国在春秋以前,得以保持光荣孤立,不受外来干扰,发展我们的古典文化者,其故即在于此。但我们又可看到,在此箭头的斜面,有一些缺口,形成险峻谷形通道,由阿姆河上游伊犁河上游通到塔里木盆地,而到甘陕。此即李希霍芬(Richthofen)所称“丝道”(Silk Road)。另外南经西南夷者,为“香道”(Spice Road)。此外,北由阿尔泰山斜面经准噶

尔门(Dzungaria Gate)有谷峡通河西;或绕萨彦岭迤东,由西伯利亚,经过外蒙满洲,亦有许多纵断谷地,特别是满蒙交界处的尼布楚、札赉泊、呼伦贝尔一带通到辽东华北。这条路我拟称为“胡道”。〔注五六〕这两条路,在遥远古代,必早为西域与塞北民族东来与南下道路。但在战国以前,规模不大。其状态有如缓缓溪流。所谓獯豸戎狄貉氏鲜卑,人数不多,武力亦不算强大,并未给中国以大的威胁。不仅如此。他们且是中国与塞外民族之缓冲者。然而战国以后情形不同了。强大的游牧民族群,以其坚强武装,由新疆蒙古满洲一带压到中国,其形势则有如急流和潮涌;并挟其他半游牧及半狩猎之民而俱下。立于此潮流之首者,即是匈奴。并且自此以后,继之而来者,源源不绝。中国的孤立就被打破了。左宗棠说:“伊古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其由来即在于此。而中国被迫西进,为攻势防御,因而使中国进入亚洲史,其原因亦在于此。

自古以来,统一帝国之成立,皆以与外族抗争(或对抗游牧民族,或征服半游牧民,或对其他农耕民及帝国抗争,或以被压迫者起而对帝国革命,取而代之)为契机。古亚加德帝国(公元前二四五〇年),古巴比伦(前一八八〇年),埃及新王朝(前十六世纪),亚述(前十一至七世纪),加勒底(新巴比伦,前七至六世纪),波斯(前六至四世纪),希腊(前五世纪)诸帝国皆然。阿育王之统一印度(前三世纪),亦大体相同,他除对抗游牧民族外,同时是对抗亚历山大帝国之东方部队的。而西北边患,则是正所以促成秦汉帝国应运而出的。

匈奴之出现,并不是一个局部的事实。在公元前十二——八世纪,即西周时代,世界日趋安定。过去许多蛮族,如赫梯人及米坦尼人等,均在征服文明民族后建国,后来为其他蛮族征服。继赫梯而兴者,是亚述。他在八世纪,统一巴比伦,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东并伊朗(包括米太、波斯),为世界最早之大帝国。此后他已不事侵略,其首都尼尼微,为中亚文化中心。大的庭园与狮子雕刻,代表他的艺术作风。此外犹太人,弗里基人,吕底亚人,希腊人,印度人,米太、波斯人,罗马人,均由野蛮进于文明。在公元前七世纪初,由西欧到中国,如地中海一带之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东至波斯印度,均已建立城市与国家,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财富与文化。而这时候,在欧亚草原沙漠地带,出现一群新的游牧民族,成为新的扰乱因素。他们一方面羡慕南方的财富,一方面由南方农耕文化国家输入技术(铜器),改善其

武器,并学习农耕民族的军事技术,以适应其马队。如是游牧民族变为一种骑马民族。此时他们发动全大陆性的南北战争,而亚欧多事了。纪元前七世纪起(即春秋初),自巴尔干南俄至中亚及西伯利亚,发展了一些骑马国家,此即前面提到的基美利人、塞契特人,和萨马特人。〔注五七〕尤其是后二者,已有王国组织。他们是骑马使剑的武士,强迫被征服者为奴。他们发明了一种铜器的武器(短刀长箭),车具马具;随塞契特而来者,还有一种“动物作风”(Animal Style)的艺术。公元前六至三世纪,即我国战国时代,西自多瑙河,经西伯利亚草原东至蒙古长城一带,普遍发现所谓“塞契特·西伯利亚·绥远文化”。自西至东,即塞契特·萨马特(Scyth - Sarmatians),塞种(Sacae),坚昆·丁零,匈奴,此四者各以南俄、哈萨克、阿尔泰山北麓、长城地带为基地、向南方农业国展开攻势。而月氏亦出现于祁连山(详下)。西方之塞契特及东方之匈奴,最为凶猛。前六世纪时,大流士尝在南俄为塞契特人击败。前五世纪后,塞契特人与希腊人通商和战争。不久,匈奴对中国的情形,亦复如此。

如是中国便面临一个“全新的敌人”。匈奴如《汉书》所言,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这与过去的蛮夷戎狄大不相同。他们的武器工具风俗制度,是与塞契特十分类似的。〔注五八〕他们是从何处来的呢?他们所有的奇畜——橐驼、骠騊(骏马)、驹騊(野马,“非胡人不能服”),都是蒙古中亚产物。他们的武器——径路刀,是亚克美尼朝波斯人的武器(Akinakes)。这是远方来的敌人。然则他们何以在战国秦汉之际,突然潮涌而至长城呢?这一方面,由于塞契特之东西扩张,以及匈奴之东西扩张,使二者发生关系。而塞契特势力方盛,匈奴被挡住了西进之路,便东到中国。游牧民族乃最初打通欧亚草原交通者。另一方面,波斯以及希腊两大帝国先后由西而东之扩张,亦不免向北方挤压,又将中亚游牧民挤得非常集中,首先促成了塞契特与匈奴之接近,接着,将匈奴等游牧民由西伯利亚东面“胡道”,准噶尔大门,挤到中国境内。在春秋以前,中国为了防御北狄,有黄河东西的华夏之族之合作。为了防御匈奴,战国以后,中国民族除筑长城以外,更加扩张大团结兼并,而有秦汉统一。秦汉统一以后,匈奴因向东西延伸,甚至与南面羌人合作,包围中国。中国不能专靠筑城自保了。如是中国亦向更东更西方面延伸,尤其是向西面延伸,遂使中国历史越过中国之境以外。而东西农耕国家也越葱岭而携手了。

秦汉以前之中亚北亚

现在,我们就文献资料之所知,略述波斯东征前后中国伊朗之间(Seriran)之关联。

公元前七世纪之初,亚述北部即因有新兴蛮族之侵袭,日趋瓦解。春秋之初(前六一二),闪族之加尔底人与伊朗族之米太人合作,灭亡并瓜分亚述帝国。东为米太,西为新巴比伦。新巴比伦灭亡犹太,掳其人至巴比伦。前六世纪初势力最盛。此后,波斯人渐兴,当时中国与伊朗间的情形,大部分还在云雾之中。所能知道的,公元前十世纪以降,已是游牧民与农耕民对立之局,夹着若干山岳民。据前五世纪希腊史家希罗多特(Herodotus)之书,在公元前七世纪以降,自多瑙河至黑海及南俄顿河伏尔加河一带者,为基美利及塞契特人。塞契特人以东至西伯利亚,则有萨马特(Sauromatae)、马萨格特(Massagetae)、阿及拜(Argippaei)、伊色顿(Issedon)、阿里马皮(Arimaspi)诸族。凡此皆游牧之民,在草原形成一串连索。其在极北,则为一素食文明国家,曰“北风外居民”(Hyperdoreans)云(“History”第四卷)。希氏所云,不脱《山海经》性质,未可视为信史。这些民族之地望、族类、语言之比定,都很模糊,尤以希腊人对塞契特一词使用得非常广泛,常以为游牧民通称为然。由基美利塞契特萨马特姓名与武器看,芬族(匈奴)、伊朗色彩甚浓,亦受希腊影响。而据希氏之书,在塞契特全盛时代,分为二部,西部为其附庸,从事耕种;东部为“王家”,则为游牧者。这是游牧帝国之惯例。我们可想见其集团民族复杂,主从并非一族。对于匈奴突厥,亦当如是观。塞契特盛时部勒其他游牧半游牧之族,因而将其塞契特化,也是可想而知的。而匈奴纵非其同种之东支,与其有关,至少先受其影响,后来又影响他们,殆无可疑。

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七世纪下半,曾有一度西移运动。据希氏的记载,因阿里马皮人之西移,引起伊色顿人西移,因而塞契特西移,与基美利人冲突。时亚述正苦于基美利,因欢迎塞契特人之协助。亚述终为米太波斯人所灭,而塞契特势力大为伸张。此民族移动最古之记载。其原因也许由于天灾;而秦穆公之称霸西戎(前六四五——六二一),迫氏羌西走,因而一串游牧民西走,我想也是一个可能之因素。

接着是一东进运动。在孔子时代,波斯之居鲁士大王(Cyrus)先并米太(前五五〇),继灭新巴比伦(前五三八),并侵入小亚细亚及希腊人之殖民地,奠定亚克美尼帝国(Achamenid Empire)基础。其子康比斯(Cambyses)征服埃及。至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五二一——四八六),西征马其顿,北至高加索,南至埃及之南,东越阿富汗而东,据阿拉伯海之北,阿姆、锡尔之南,势力伸至北印度之五河(Punjab)之旁,其影响当然也到葱岭一带之边缘了。他在西面对赫梯人,亚述人,及埃及人抗争。在伊朗高原,统治伊朗人及“非伊朗人”。伊朗人中,包括阿姆河流域的康居(Khuwarism)、大夏(Balkh)、粟特(Sogd)、安息(Parthava)等。非伊朗人区域,包括里海附近及俾路支一带。里海东面北面一带,则伊朗所谓“敌人”(Dahae)及塞迦族(Saka, Sacae)区域。〔注五九〕这在后来,逐渐变为土朗(Turan)区域。〔注六〇〕匈奴之确实出现于中国,是前五世纪以降之事,可能是受了波斯东进之压力。

不久,我们又看见一个西进运动。自战国之初,秦晋赵不断与戎、胡及匈奴斗争。前五世纪中叶,秦晋逐大荔之戎与阴戎,羌族西逾汧陇。此戎(羌)也许是匈奴到中国后受到压力南下的。他们被逐而西,不到几年,赵襄子过雁门,破并代以御胡貉。此“胡”见于记载之始。自此中国与羌胡冲突频繁。而在西亚,亦为塞契特之极盛。

在前四世纪,又有一大东进运动。大流士之世,希腊已兴,乃有波希之战。大流士征服希腊二次失败,其子薛克斯(Xerxes)远征希腊亦失败(前四八五)。此后波斯日益腐败而衰弱。一百五十年后,轮到希腊人复仇了。公元前三三一年(孟子见梁惠王,张仪相秦之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王统一希腊后,进攻波斯。亚历山大以三万五千骑兵,第一次破波斯军四万,复破波军六十万,最后,波斯组织一百万的伊朗军和亚洲殖民地军,包括塞迦人在内,亦被亚历山大以五万人击溃之。大流士三世死于乱军之中。亚历山大乘胜踏着大流士之足迹东征。前三二九年,入阿姆、锡尔一带,臣伏大夏、粟特,筑城于大宛(Fergana)。并与塞契特酋长之女及大流士三世之女结婚。其将士亦纷与当地居民结婚。前三二七年,深入印度五河地方。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死于巴比伦。诸将争承继,前三〇一年承继决战后,帝国四分,在欧洲者曰马其顿,托雷斯;在埃及者为朴托莱梅(Ptolemy)王朝,都于亚历山大城;在亚洲者为塞流卡(Seleucus)王朝,都于叙利亚之安都(An-

tioch)(今在土耳其边境),后又建城于底格里斯河岸,曰塞流卡特昔芬城(Ctesiphon-Seleuchia)。于是希腊文化传播于欧非亚三洲,蔚为大希腊风(Hellenism)时代。(此词狭义指亚氏远征迄罗马帝国成立时的希腊文化,广义则对希伯来主义而言。)

五十年后,希腊人在亚洲之政治权力,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秦惠文王大举攻义渠(前三一四),赵武灵王之胡服(前三〇六),是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十余年间之事。

在前三世纪有一西进运动。秦灭义渠后,即不再见戎患。唯秦与六国之战方酣之时,匈奴势力日大。前三世纪末,有李牧蒙恬之大举攻匈奴。在西方历史上,自公元前四——二世纪,则有萨马特人压迫塞契特人,终于占领黑海一带,其中包括后来中国及罗马史上之奄蔡及阿兰人(Alans)。
〔注六一〕

这是公元前七世纪以降到汉初为止,中国伊朗间西进、东进两个潮流之节奏。而这和草原方面游牧民族之进退兴衰,又如此息息相关。故其间纵非有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断非绝无牵涉的。

我相信秦赵之攘夷,与塞契特西进代基美利人,萨马特人西进代塞契特人而起有关。而波斯希腊之东进,促进许多游牧民族伊朗化希腊化,以及其他部分之东移。此使匈奴塞契特化,亦使塞匈风俗,传到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前四五三年),赵襄子伐胡貉后攻智伯,以智伯之头为饮器,是一个显著的塞契特匈奴之风俗,与中国精神相反,而使豫让愤然报仇的。一百五十年后,赵武灵王不得不胡服骑射以御胡。而后来秦人武器艺术,亦日益受匈奴人影响。无论如何,自居鲁士到亚历山大东征,将他们所谓塞迦、塞契特人驱向阿姆锡尔河以东,我想是战国末期中国西北日益紧张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由东北到西北,只有夷狄戎及氏羌之属,而甘肃西南,新疆西藏一带,殆仍以氏羌为大宗。战国之初,东北方面始有胡貉之南下。中叶以后,在内外蒙古者为匈奴;其东则乌桓鲜卑;其北为丁零,其西北为坚昆;匈奴之西南则仍为氏羌。而自甘肃以至天山北路者,则有乌孙月氏塞种(详下)之属。据今日的资料,汉代新疆,伊朗系与吐火罗(即月氏)系语言甚为流行。我以为乌孙月氏塞种之属,以及伊朗系吐火罗系语言,一部分是大流士及亚历山大东征后进入新疆的。

此后在东亚,因六国相争而坐大之匈奴,虽为李牧蒙恬所败,旋有刘项

之争,遂乘机“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相争”。而在中亚,则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中,印度安息独立,大夏安息塞流卡诸国相争,塞契特势力乘机扩张。不过前三世纪来,中国伊朗间最大之游牧帝国,终推匈奴,他的势力逐渐东西扩张,在他西面的游牧民,则以萨马特人为主。由此东进西进之叠相激荡,土朗伊朗之分,遂以形成。前三世纪后,所谓塞契特者,与以前的成分大为不同,土朗色彩多于伊朗色彩了。〔注六二〕

接着是汉之西进,罗马之东进。亚历山大东征后约二百年,欧亚二洲接连的由罗马人与汉人发动两个持续的前进运动。但罗马前进在文化上无新意义,规模亦不如希腊。而汉人之西进,不仅远过秦赵;如想到新疆通道非伊朗高原可比,则汉人较之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精力是过之无不及的。

其一,在欧洲,在大希腊风时代受希腊人教化之罗马人勃兴,先灭迦太基。自公元前二一五——一九六年,一再击败马其顿之得意的密集方阵战术。自前一九〇年前起,不断攻击塞流卡帝国。前一四六年马其顿灭亡。同时,罗马人迫塞流卡帝国割小亚细亚之地,设亚洲省。前六四年,叙利亚变为罗马之一省。前三〇年埃及入版图,罗马帝国时代开始。他以希腊帝国承继者资格,为争夺亚美尼亚及米索布达米亚,先后与安息及萨珊波斯作长期斗争。

其次是汉代对匈奴之抵抗与进攻。秦末匈奴之势虽大振,汉人统一,终阻止其南下。如是匈奴西破月氏,乃有月氏塞种之迁移。继而中国进击匈奴,开道西域,如是继大希腊风之后,有一秦汉风或大汉风的时代。而匈奴西迁,吠哒南下,鲜卑入华,突厥勃兴之一连串事变,接踵而起。东西大通,各种宗教和会,或西去,或东来。而西罗马之灭亡,日耳曼人之建国,隋唐帝国之成立,大食帝国之勃兴,也都是在这一潮流激发而起的波动。汉人之西进及加入亚洲史,其后果之重大而深远,实在亚历山大东征之上。这是近代欧洲史家所没有充分看出的。兹先就两汉之事略述如下。〔注六三〕

抗匈战争与设立四郡

秦始皇时代,正匈奴头曼单于时代。他开始组织附近部落,以库伦及和林为中心,统一内外蒙古为一强大骑马国家,进而为一游牧的联邦帝国。〔注六四〕头曼当然也是受了秦人文化的影响,但基本是塞契特式的。当秦

与六国战争之时，匈奴乘机南下，进据河套。并进而与秦始皇相争。如上所述，秦既统一中国，即进而抵抗匈奴。前二一五年，蒙恬将匈奴逐出河套，匈奴东受东胡，西受月氏之压力，退至外蒙。秦楚之际，匈奴复振。有头曼之子冒顿，与刘邦同时，杀父自立，乘刘项之战，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东灭东胡（乌桓鲜卑）至于朝鲜，西击月氏，北服丁零，遂南下楼烦（雁门一带），复蒙恬所取河套，并入侵甘肃之朝那（固原），陕西之肤施（延安）。刘邦亲自抵抗，被围白登（大同附近）。《史记》曾记当时匈奴骑兵军容之盛。步兵之雄之刘邦知不能敌。用陈平计，派刘敬许以宗室公主（即和亲）及酒米金帛，始脱围而走。刘邦死，冒顿致书吕后，要娶其为妻。吕氏大怒，召集会议。樊哙请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曰，樊哙可斩也。于是卑词厚币和亲以羁縻之。至文帝，仍唯有和亲，贿赂，岁送金帛之一法。然而，匈奴还是不断进攻。这是贾谊流涕之一。〔注六五〕冒顿得汉之财物，兵益增多。由今日绥远发掘出的军器，可知绥远成了匈奴的军需根据地。文帝时，即前一六九年左右，他进攻甘肃的月氏，以其王头为饮器，并定乌孙呼揭楼兰及西域二十六国。而氏羌遂亦受其控制。初，乌孙月氏均住祁连敦煌间。月氏一时强于匈奴，曾杀乌孙之王，并能威胁中国。〔注六六〕至是月氏弃河西而西迁伊犁。当时住伊犁者为塞种。月氏逐之，塞种西迁（前一六〇左右）。至武帝初，约前一三九年左右，匈奴又助乌孙王昆莫逐月氏，月氏再西迁，塞种再南下（详下）。这是民族第一次大移动，引起中亚大变动。如果当时汉族不能团结而为统一国家，这洪流可能先冲到中国的。

匈奴灭月氏后，成为“强胡”，成为“百蛮大国”。此塞外霸权之一变，亦东亚均势之一变。〔注六七〕乃乘胜致函文帝，倍加威胁。汉廷不敢言战。刘邦时，已有韩王信、卢绾降匈奴，为其策划。冒顿死，老上单于立。文帝派宦者中行说送公主和亲，也投降匈奴。老上来函，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单于”，不断要挟，并出兵掳掠。文帝始设六将军从事防御。老上死后，军臣继位。景帝还是继续和亲政策。军臣不时骚扰。晁错尝比较中国与匈奴之短长，以为除马不如外，弓矢仍强于匈奴，然兵凶战危，万全之计，在以夷制夷，并移民实边，加强守备（《汉书》本传）。但亦可见汉人渐有信心。七国乱时，颇有勾结匈奴者。幸迅速解决，未为大害。

自冒顿至军臣，为匈奴全盛期。他们由中国及东面与西南面各族征收大批赠物和赋税，并常吸引中国降臣，助他们打听消息，做政治军事的顾问。

韩王信,卢绾,中行说是最早的汉奸;这是“恐匈病”的必然产物。汉朝如继续无抵抗政策,经济负担与政治危险,都是很严重的。

但汉人并非无能为的。文帝以来,除注意培养国力外,即从事整军经武,训练士马(详下)。白登之围后七十年,到了武帝之世,国家统一,兵马亦强,也就到了与匈奴摊牌的时候,由“备胡”而“击胡”了。武帝时代对匈用兵凡二次:第一次作战九年,第二次作战约十年。

月氏离甘肃西迁后约三十年,武帝即位(公元前一四〇),一开始即准备进攻匈奴。但汉人还极慎重。熟悉边事的主父偃,认为不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不能作战。听说月氏与匈奴有仇,先派张骞出使联络月氏(前一三九年)。马邑事件(前一三三)后,两国绝交。主战的王恢自杀。第一次张骞出使,如下所述,并未成功。不等到回国,前一二八年,匈奴攻至辽西渔阳(北平)雁门。李广与卫青出师不利,但这当是试探性的。故翌年,汉军反攻。自此至公元前一一九年,以卫青、李息、霍去病督师九次,重要战役凡三:前一二七年破匈奴于河套。先是武帝于陇东及宁夏南部置安定北地二郡。至是于绥远置朔方郡。匈奴失牛羊百余万。翌年军臣死,匈奴内争,其弟伊穉斜为单于。军臣之子降汉(是年张骞归)。右贤王复大举入寇。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复与公孙敖过居延,攻祁连山,杀匈奴三万八千人,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匈奴右部遂入于汉,初置武威(凉州)酒泉(肃州)二郡。但右翼之李广在热河为左贤王所败,李广失道自杀。前一一九年是最大决战,汉决定绝漠击匈奴,霍去病攻至瀚海(贝加尔湖),“杀虏八九万。汉军死者数万,马死者亦数万”。自此匈奴远遁漠北。前一一一年分武威、酒泉,增置张掖(甘州)、敦煌(沙州),是曰河西四郡。武威,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浑邪王地也。于是“西域之路开,羌胡之路隔”。武帝募民十万实边。增长城,设亭障,保障此一走廊。匈奴既失绥远的军需重镇,复遭惨败,无力反攻。汉亦失兵马甚多,亦须休息。

此后十五年间,武帝从事于西南夷,两粤,朝鲜活动。鉴于匈奴败而未服,张骞回后,前一一七年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成功,公主出嫁,西域大通。然两次对大宛用兵(见下)时,又内为奢侈(土木,封禅,巡狩),汉力衰敝。而匈奴则休养生息之后,卷土重来。前一〇〇年,苏武出使匈奴被留。翌年,对匈之战再起。然汉已师老兵疲,或将悍兵骄。武帝用李广利率师出外蒙,尤不得人望。李陵苦战被俘,武帝杀其家人,遂降匈奴。匈奴复以汉

降将卫律攻李广利。前九〇年李广利惨败，后亦投降，汉军数万失踪。自此武帝讳言战争了。而他死后，西南夷乌桓不安，匈奴复来入寇。

昭、宣帝时，汉之国力逐渐恢复，赵充国防御有方，匈奴不得逞。羌（青海）及西域之经营，颇有成效。宣帝时，匈奴大举攻乌孙，公主求救。前七二年，汉乃派赵充国常惠连西域兵大败之，得牛羊七十余万。匈奴遂衰耗。后遇大雪，家畜死亡甚多，又受乌桓、丁零、乌孙三面夹攻，内争复起。匈奴右部之日逐王（统治西域者）率众降汉使者郑吉，郑吉始为西域都护。时赵充国已定羌。匈奴无力南侵西侵，自相攻战。对汉主和主战，意见不一。后分为二部，曰呼韩邪，曰郅支。东匈奴呼韩邪遂降汉称臣，守受降城（河套北）。而郅支不服远走新疆，西破乌孙，北击乌揭，西破坚昆，北服丁零。并乘乌孙康居不和人康居。元帝时，副校尉陈汤，都护甘延寿深入康居，终斩郅支（前三六年）。如是呼韩邪回去统一匈奴。元帝以昭君嫁之。此后中国与匈奴维持和平者百年。中国对匈奴赏赐甚大。哀帝时，绢达八万四千匹之多，匈奴以此贩于罗马，国益富厚。今日外蒙诺颜乌拉地方出土之汉漆器铜器锦绣甚多，这些东西，亦与塞契特式之器物同在，可见当时匈奴之文化。大概而言，是汉化之增进。

王莽时，匈奴复叛。后汉初，匈奴地区旱蝗大作，遂再分为南北。这包括民族之分化，尤其文化之分化。南匈奴即呼韩邪之后，亦王昭君之后也。多至中国北部，渐事农耕。而北匈奴则屡犯长城。光武初亦持重。唯利用南北匈奴相争，收以夷制夷之利。然侵寇不止。河西城门昼闭。明帝始派窦固，耿忠耿秉祭彤来苗等四路出兵，击之于天山（吐番西），追之于蒲类（巴里坤），屯田伊吾卢（哈密）（公元七三年）。而鲜卑、乌桓、丁零亦夹击匈奴。章帝时，北匈奴常南侵南匈奴。和帝元年（公元八九年）窦宪耿秉邓鸿等始率兵大破北匈奴于燕然山（外蒙杭爱山），此即当年李广利惨败之地。四百年来匈奴之威胁，始告解除。班固所谓“摅高文之宿愤，振大汉之天声，一劳永逸”者也（《燕然山铭》）。两年后，又破之于金微山（阿尔泰山）。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扬雄云，“北狄真中国之坚敌也。”此坚敌遂远遁。这在中国和西方都引起民族移动的大潮流。

北匈奴逃亡后，南匈奴与汉人杂居山西陕西之西北。虽渐次安定，桓帝之时，羌乱刚了之后，与乌桓、鲜卑共同寇边。南匈奴为张奂所平。但鲜卑渐强，匈奴为其所侵（五胡乱华仍匈鲜对立）。建安中来朝，曹操分五部节制

之，大多居于山西。至西晋末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

北匈奴逃走后，初在乌孙康居之间游牧，不时与车师侵袭中国。据延光二年（一二三）敦煌太守张珣云，“北匈奴之呼延王常展转蒲类海（今巴里坤）秦海（即黑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后汉书》西域传）。其后鲜卑渐兴，北匈奴之踪迹，不甚分明。唯据《魏书》，尝在“康居西北建悦般国。凉州人犹谓单于王”。又云，杀奄蔡之王而有其国云。而二世纪以后罗马史上渐有 Khunni, Phuni, Unnoi, Hunni, Huns, Fins 之名出现，三四世纪时在今日俄境伏尔加河东岸，先征服阿兰人，与中国史志相符。继征服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逐渐引起欧洲民族大移动。至五世纪，阿提拉（Attila）提兵入欧。沿路的汉代文物，可以证实他们的来龙去脉。续详下章。〔注六八〕

匈奴虽曾为中国之大敌，然在中西文化史上，固曾演重要之作用。彼等控制欧亚草原之东端以及“胡道”，直接将塞契特之文化，间接将伊朗乃至希腊文化带入北亚与蒙古以及内蒙。他们在军事上在国防上，刺激中国人民之尚武乃至于统一。及与中国转入长期相持之状态，亦努力吸收中国之文化；及其败走，又将中国文物经草原道携至西方。今日在绥远出土之武器，库伦以北古墓中之汉代器物，在乌拉山东托波儿附近发现的前汉铜镜，以及在西洋民族移动时代匈人、阿兰人、阿瓦人（Avars）前进道上所发现的汉镜，汉弓，汉绢，使我们对此一世之雄的匈奴帝国历史，以及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作用，更为分明。〔注六九〕中国文化之传入外蒙，促成了匈奴之分化。而匈奴之西迁对于日耳曼人在精神上及政治上技术上的影响，是我们知道的。至于在精神上的影响，犹待考索。已知者，匈奴人在道德上已大受汉人影响。《后汉书》南匈奴传注：“匈奴谓孝为若鞮，自呼韩邪降后，与汉亲密，见汉帝谥为孝，慕之；其子以下，皆称若鞮。”而阿提拉之在西方，据威尔士云，不仅用兵如神，且能仁民爱物，爱好文学云（《世界史纲》）。匈奴是一勇敢民族。我们应以中国民族中有其血液自豪。而如果匈牙利和芬兰是其后裔，我们也真希望他们能无负其祖先。

西羌、乌桓、鲜卑

匈奴游牧帝国之瓦解，除汉得四郡之地，西域城郭之民获得解放，中西交通大开之外，就匈奴势力范围而言，后果有三：一、一部分农耕化，如南匈

奴。二、他的同盟者，即半游牧民族之西羌，继续与中国作战。三、他直接统治的游牧民族，则脱颖而出，代之而兴；首先是乌桓和鲜卑，后来是柔然和突厥。匈奴为一切游牧帝国之典型。西晋中国内乱时，南匈奴起事之后，西羌鲜卑先后建大帝国。结果亦不出二途：或如南匈奴合流汉族，或如北匈奴西走。

羌为亚洲一大族，亦我族一大支，传为三苗之后。《商颂》已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周初，庸蜀羌髳濮，曾与牧野之师。周室东迁，亦因犬戎之难。春秋时，自甘肃至伊洛，往往有戎。戎，氐羌也。其分布之广，遍及甘肃四川云南新疆，青海西藏更无论矣。〔注七〇〕战国之初，秦赵逐之而西。余众为秦役属，一部分集于黄河、赐支、湟河三河间（今青海甘陕间），魁曰爰剑。此即所谓西羌。四传至研，其势大盛，凡百余种。始皇与六国相争时，种人尤大繁息。其在甘肃、四川、云南，属于西南夷者，称东羌；在新疆者，称南山羌。冒顿之时，西羌臣于匈奴，共扰中国。及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众始服汉。后攻金城（兰州），李息大败之，置护羌校尉。宣帝时复叛，赵充国平之。其后烧当羌最强。王莽时及东汉初，屡攻中国。后又与丁零战而胜之。其后与汉屡战屡降，屡降屡战。而居内地者，每为豪右吏民所欺；诸将出征，常焚其庐落，故羌人大恨。终汉之世，羌乱不绝。安帝初（一〇七），羌祸大发。邓骘派任尚（即在西域败事者）率军五万与羌数万人战于甘肃之通渭县，尚大败。其中一种曰滇零羌者，自称天子。其时郡吏多内地人，无战意，争徙内郡，百姓不愿迁者，则刈其禾，焚其居，大概是一种“焦土政策”。于是汉人颇多投羌；羌祸遂如火燎原。三年，虞诩始大败之。十余年间，用去军费已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军民死者不可计。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至顺帝时，东西羌会合，入三辅，烧园陵，杀吏民。七年间，用且八十亿。“出于平民，回入奸吏。江湖之民，群为盗贼。青徐饥荒，人民流离，军士劳怨”。至桓帝时，段熲始决意进击，灭羌于平凉（一六九年），凡百八十战，斩首者三万余。用四十四亿，汉军死者数百人而已。羌寇略定，而黄巾起矣（《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西羌传）。至晋，羌与氐复大振。

乌桓与鲜卑，据《后汉书》，本东胡，为冒顿所灭，余类保此二山为号。〔注七一〕时乌桓在辽河之西，而鲜卑在西刺木伦河之北。两部皆自推强健公平者为“大人”。武帝移置于辽东及东内蒙古，以乌桓校尉监之，为汉侦察匈奴之动静。王莽时，乌桓丁零之兵变发生，郡吏杀其质。光武时，遂与匈

奴连兵为寇，马援御之而败，辽东颇受祸。其后匈奴内乱，乌桓攻之。光武联络乌桓，鲜卑大人亦归附。灵帝末，乌桓据辽东辽西，中山太守张纯附之；其大人曰蹋顿，尝助袁绍击公孙瓒。曹操平之，收为天下名骑。我以为后来所谓“鞑靼”，或由蹋顿而来。乌桓自此多归化了。鲜卑在乌桓以北，汉初未通中国。光武时，与匈奴入寇辽东，太守祭彤大破之。南匈奴既降，愿为中国保塞，始通译使。自匈奴之衰，渐有其地。及北匈奴逃走，追击其后。灵帝初，有檀石槐者，立庭于歃仇水上（当绥远岱海），北拒丁零，东却扶馀，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分为三部：东自右北平以东，其魁曰弥加阙机素利等。中自上谷以东，其魁柯最阙，居慕容寺。西自乌孙以东，大人有置鞑落罗等。幽并凉三州均受寇掠。蔡邕云：“自匈奴遁走，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为之谋主，兵马过于匈奴。”檀石槐死后，三部分裂。小种鲜卑轲比能继起。及袁绍据河北，中国人亡叛者多归之。后曹操破之（《后汉书》、《三国志》乌桓鲜卑传）。然其势已成。汉魏间，慕容、宇文、段、拓拔诸部并起。

西域之开通与经营

自汉“列四郡，据两关”（北玉门，南阳关，详下），西域即在望了。

《史记》大宛传记西方诸国，尚无统一之名。西域之称，始于《汉书》。自汉至唐，此名词狭义指玉门以西，葱岭以东，即清初新疆南北二道之原来界线（包括今俄属中亚之一部分）。〔注七二〕广义指中国伊朗间，即葱岭里海间，即今俄属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更广义则不仅包括波斯与伊拉克，印度与阿拉伯，即欧洲亦泛指之。

“西域之迹，开自张骞”（以下多杂引《史》、《汉》原文编成）。汉朝为寻求盟国夹击匈奴，募能出使月氏者。张骞应募于前一三九年，西使月氏（时月氏西迁塞种故地伊犁），为匈奴所留，凡十余年，娶妻有子，终脱走。是时月氏又为乌孙匈奴联军所破，离开伊犁，乌孙据之。骞不知月氏何往，先至大宛，得月氏踪迹，由大宛送其至康居，康居引导其至月氏，则月氏已臣大夏而君之，都妫水（即阿姆河）北为王庭，地肥美，无报仇意，且距汉及匈奴已远。〔注七三〕骞不得要领，留岁余，由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军臣死，始亡归（前一二六）。当初从者百余人，十三年后，唯一人从之同归。所至有大宛，